

金融危机与世界格局的新变化

尹承德

【关键词】 金融危机、世界格局、新变化

【提要】 金融危机使世界力量结构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球战略格局多极化、南北差距趋小化、地缘力量均衡化、制度模式多元化趋势同步快速发展。但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化仍处于渐变和量变过程，尚未发生突变与质变。美国独超地位、北强南弱态势、西方模式主导仍将维持相当长的时期。

【中图分类号】 F8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2011)2 期 0038—08

【完稿日期】 2011年1月20日

【作者简介】 尹承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一、世界战略力量多极化趋势 加速推进

后冷战时代，独超单极与诸强多极之争构成了世界战略力量格局的主要形态和世界基本矛盾之一。百年难遇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凸显了世界发展不平衡规律，使力量天秤大幅向诸强倾斜，多极化进程获得前所未有的强势发展。

（一）独超实力地位加速全面滑落， 建立由其独家支配的单极世界秩序的 企图趋于破灭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前总统克林顿主政的8年，美国新经济突飞猛进，GDP以年均3.4%的幅度较强劲增长，达到独超实力鼎盛阶段。进入21世纪，随着其经济痼疾发酵和新经济泡沫破裂，加上纠缠反恐和陷入两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美国经济和独超实力持续下滑。金融危机加剧了其下滑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经济增速和实力地位锐降。前总统小布

什当政的8年，美国经济结束了其历史上最长的扩张期，增速急剧下降，甚至一度陷入负增长。小布什坐镇白宫的最后一年多和奥巴马上台之第一年，美国爆发和经历二战后以来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更是遭到灾难性重创：连续18个月陷入衰退，其中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GDP降幅分别达6.2%和5.7%，降幅之大为历史所罕见；^[1]新增失业人数760万；蒸发4.1%的经济增长和20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吞噬美国人21%的实际财富。^[2]自2009年下半年起，美国经济虽然走出了衰退，但仍受创历史记录的高失业率、高财政赤字、高债务的困扰，复苏乏力。长期经济低迷和受危机打击，美国经济实力地位直线式下降，2000年美国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近三分之一，2005年下降至25%，2010年再下降至约22%，10年滑落约10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随之逐年缩小，现在其贡献率只有10%左右，远远落在中国之后，其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作用已经成为历史。

其二，美元的世界金融霸主地位严重削弱。美

[1] 新华社华盛顿2009年5月29日电。

[2] 《天津日报》2010年9月22日，第4版。

元之所以能长期作为世界主导货币，一是靠实力，二是靠信誉。现在这两大支柱都趋于坍塌：一是美国实力大降。美元在二战后登上金融霸主宝座主要凭借其时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 60% 以上的实力。现在美国的经济总量仅为全球的 1/5 多一点，难以支撑美元的全球本位货币地位。二是美元信誉大跌。美国长期大力维护美元的世界主导货币身份，而不负起相应责任。它为了一己之私，任由美元像脱缰野马在全球疯行，以对冲其所欠巨额外债和变相攫取各国的财富与资源，严重损害了美元的信誉。2010 年 11 月，美联储出台新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决定印制 6000 亿美元现钞购买政府长期国债，大肆向各国转嫁其经济困难，引起国际社会的同声反对，使美元的信誉降到历史新低。

美国经济实力地位衰降和利己主义的货币政策推动国际社会改革美元本位制世界金融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目前，有的国家将本国货币与美元脱钩而与欧元挂钩；有的国家在双边贸易中不用美元而用本币或欧元进行计价和结算；有的国家在本国外汇储备中减少美元而增加其他通用币种；有的国家提出创建取代美元的新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快了改革进程，将美国在其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分别降至 17.4% 和 16.5%。这些从各个侧面反映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严峻挑战而急剧下降。美元世界金融霸主地位是系在全球霸主美国颈上的“通灵宝玉”，是美霸权帝国的灵魂和生命。其衰降是美霸地位衰降的风向标。

其三，美国软实力尤其是国际影响力和声誉严重下挫。美国国势减弱，犹紧抱旨在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不放，势必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损人自损。奥巴马政府推出“外交新政”的第二年，比之其第一年更加乏善可陈，在反恐、防扩散、应对气候变化、中东和谈、推进全球民主、对拉美外交和对华关系等诸多领域的政策目标无不受挫。特别是它推出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其损人利己的面目集中大暴露，大失人心与信誉，被包括其盟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群起而攻之。它在 G20 首尔峰会上所提各国应将本国的国际收支项目顺差和逆差

控制在 GDP 的 4% 以内和压人民币大幅升值的主张无人响应，反使自己陷入被动孤立。这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主导地位的滑落。

基于严酷现实，奥巴马不得不对美国的世界定位做出一定调整。其前任小布什把美国定位为罗马帝国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是世界上唯一绝对的主导力量，把建立由美国一家支配的单极世界作为其“天赋使命”。布什政府国务卿赖斯把美国支配的单极世界称为能给全球带来和平、安宁、稳定的“理想世界”，抨击诸强主张建立的多极世界是“邪恶的”，是造成国际形势紧张和危机之源。这种过分夸大美国力量和“帝国称霸”逻辑是小布什政府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和狂热推行单边主义外交的思想根源。奥巴马则不把美国的力量绝对化、神话化，而强调美国“决不当世界老二”；不再提建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而强调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强国，应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不再抨击多极化主张，而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现实。奥巴马对美国实力地位和世界大势的认识无疑比小布什更清醒和务实。历史进程表明，美国独超实力下降和走向衰弱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它要建立由其呼风唤雨单极世界秩序的目标已不可能实现。

（二）诸强实力实质性提升，在与独超世界格局之争中愈占上风

欧盟经济总量早在 2003 年就已超过美国。^[3]现在虽然一些成员国陷于债务危机，但总体上它已走出危机阴影，尤其是德、法等大国经济复苏较好，其中德国 2010 年经济增长达 3.9%，是发达大国中增长最快的。更重要的是，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取得突破性进展。2010 年是欧盟实施带有宪法性质的《里斯本条约》的开局之年，成果显著：选出了具有某种主权国家总统职能的新的欧委会主席，决定设立类似主权国家外交部的“外交署”，这是其政治一体化深化的标志。军事力量整合也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两个军事大国英国和法国 2010 年 11 月签署军事协议，内容包括创建名为“联合远征

[3] EIU: Country Report, European Union, Jun, 2004.

军”的快速反应部队、实现核军备共享、联合使用航空母舰等。英法军事整合对推进欧盟实行共同防务政策有里程碑意义，将成为欧盟防务一体化的前奏和催化剂。^[4] 这些极大地增强了欧盟的内聚力，表明它朝着成为真正的全面一体化实体和世界独立一极方向迈出了关键性步伐。有的西方媒体甚至评论说，欧盟 2010 年一体化进程的成就展示了“欧罗巴合众国”的未来前景。

俄罗斯走出危机重新步入复兴轨道。2010 年经济取得 4% 的较高增长。随着油价再度攀升，其财富继续激增。为应对战略对手地缘战略攻势和挑战，俄坚持发展尖端武器，保持了军事力量超强地位。俄政府还决定今后 10 年支出 20 万亿卢布（约合 6460 亿美元）巨资重振俄军，以确保其军事超强地位，加固其作为世界大国的战略支撑。俄的大国外交也取得突出成就，如全面加强了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增强了它们对俄的向心力，巩固了俄的地缘战略依托。

中国的国力再上新台阶。在世界金融危机肆虐的 2008 年和 2009 年，中国经济仍实现年均近 9% 的快速增长。2010 年是中国经济全面跃升的一年：经济增速达 10.3%，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国实现的一次历史性跨越；外汇储备达 2.85 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外贸总额近 3 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吸收外资近 1057.4 亿美元，外资总额约达 1 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国。同时，中国对外投资成倍增长，2009 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达 3000 亿美元，是 2002 年的 32 倍，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输出大国。201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望突破一千亿美元，外资存量可望达到 5000 亿美元。^[5] 中国的国防、科技力量和软实力也同步大幅提升，尤其是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已跻身世界舞台的中心，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欧、俄、中都主张和致力于构建多极世界，反对独超单极战略，它们力量的显著增强有力地推进

了多极化进程。

当前世界力量结构中还发生了有利于促进多极化的新变化，那就是随着印度、巴西、南非和东盟等地区大国与一体化实体的崛起，世界力量中心突破了原先的美、欧、日、俄、中五大力量范畴，它们也逐渐成为力量中心。这些新兴力量也反对独超一家支配和主宰世界，主张建立多极化国际秩序。它们的兴起为世界多极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

（三）多极化格局隐现雏形

在危机中诞生的 G20 实际上已取代 G7、G8，成为国际社会讨论世界经济问题的主要论坛和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有可能发展为未来世界多极化结构的主要载体。其一，它是由世界 19 个主要经济体和欧盟组成的，经济总量占全球 90% 以上，其成员国囊括了世界上所有发达大国和发展中大国，有承载多极化格局的足够能力和代表性。其二，它在处理危机中形成的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合作共赢的原则和不是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国操纵，而是由所有成员国平等参与、共同协商决策的精神，体现了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与利益诉求，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代表了多极化格局下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其三，它已超出了 G7、G8 那样的纯论坛性质，具有一定的决策功能。如在其峰会上先后就 IMF 和世界银行份额与投票权的调整与改革达成决定性共识，再交由该两机构具体落实。这表明它可以成为全球治理的合适机制。其四，它是发展和开放的。现在它主要讨论和应对世界经济问题，但随着国际形势演变、全球性挑战问题增多和加剧，它有必要和可能扩大为讨论与应对包括世界经济、政治、安全、气候变化等一应重大问题的机制，全面承担全球治理使命。

G20 本身就是世界多极化进程发展的产物，也使多极化格局隐现端倪。它的发展走向可能最终构成未来世界多极结构的基础。

今后，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世界力量中心将

[4] 余方合：《金融危机催生欧盟军事合作》，《解放军报》2010 年 12 月 30 日，第 8 版。

[5] 新华社北京 2010 年 9 月 1 日电。

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引领世界多极化进程继续快速推进。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美国这匹“骆驼”还远谈不上“瘦死”,只是“变瘦”而已。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国的综合国力仍执天下之牛耳,遥遥领先于任何一个力量中心,其独超地位无国可代。只要美国的独超地位不变,世界多极化进程就只能是一种趋势,世界多极化格局就不会最终确立。

二、南北差距愈益缩小

有一种通常说法是南北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这是指世界上最穷国家和最富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别而言,而不是反映了整个发展中国家和整个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别状况。事实上,就整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金融危机加速了南北经济实力差距缩小的趋势。

当代世界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南北之间,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远快于发达国家。在冷战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亚“四小龙”、“四小虎”先后崛起和中国的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增幅要比发达国家平均增幅高出约2个百分点。进入新世纪,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带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强劲增长。近10年,南方国家经济增速是北方国家的两倍。金融危机更加拉大了南北经济增速的差距。2008年至2009年,北方国家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南方发展中国家平均增幅仍达4%以上。2010年,发达国家经济仍然困难,复苏乏力,发展中国家却获得平均7.1%的高增长,是发达国家的两倍多。^[6]

南北双方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导致双方经济力量发生较大的消长变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差距愈益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前者的经济总量不到后者的10%,2000年、2009年分别增至24%和33%。^[7]到2010年上升到

后者的40%。按照IMF提出的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09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51.87%,首次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8]

南北经济实力对比的重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权力格局。长期以来,世界经济及其机制化组织一直为西方所垄断,其“游戏规则”的制定和运作权完全操之于西方大国之手。近些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壮大,特别是新兴经济的崛起,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明显上升。现在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参与,任何一个重大的世界经济问题,包括能源危机、粮食危机、金融危机、生态危机,都得不到有效解决。同时,在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下和迫于形势,西方国家不得不向它们转移国际金融机构的部分权力。世界银行2009年一次性向发展中国家移交3%的份额和投票权。IMF于2010年完成了其历史上第一次最大的权力制度改革,一次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和投票权。现在,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份额增至42.3%,投票权超过40%。发达国家在IMF中的绝对垄断地位结束了。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和地位快速提升的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从长远和历史进程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终平分秋色,前者甚至占据优势的前景是可以预期的。但现在和在今后较长时期,北强南弱的局面不会根本改变。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尚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人均GDP不及后者的十分之一。两者经济的技术含量、质量和效益、效能不可同日而语。在政治、军事、科学、文化、教育力量方面,前者更远远落后于后者。同时,发展中国家虽然在世界经贸和金融机构中增加了一定的发言权,但这些机构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仍基本操之于发达国家之手。仅美国一家就握有IMF的否决权,只要美国不同意,这个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就无法通过任何重要决议。这些说明发展中国家要在经济上和整体实力上赶超发达国

[6] 徐伟:《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危机中继续崛起》,《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12月30日,第9版。

[7] 《全球经济重心东移趋势明显》,《天津日报》2011年1月22日,第7版。

[8] 唐焯等:《理性看待新兴经济体崛起》,《解放日报》,2010年8月31日。

家，在世界经济权力格局中取得和发达国家基本平权地位，任重而道远。

三、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趋于均衡化，世界战略重心加快东移亚洲

几百年来，欧美一直是世界政治、经济中心，亚洲基本上被边缘化。二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情况才开始有所变化。最近30年来，大东亚地区经济腾飞、崛起之势有如狂飙突进，亚洲的地位节节攀升，全球战略重心明显向亚洲倾斜。其主要标志和表现是：

（一）东亚兴起为世界三大经济中心之一

从20世纪80年代初迄今，包括“四小龙”、“四小虎”、中国、印度在内的大东亚地区年均经济增幅约达8%，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亮点和增长的主要板块。其间，美欧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陷入低速运行，甚至出现衰退，其平均增幅不及前者的1/3。金融危机更加拉大了东亚与欧美的增速差距：后者将近两年陷入衰退，前者平均增速仍达约7%，2010年，后者复苏仍乏力，前者经济平均增长8.8%，是后者的三倍半。^[9] 这使东亚地区的经济规模以加速度缩小与美欧的差距。以东亚新兴经济体与美国GDP相比较，1980年前者大约只为后者的12%，以后两者的差距逐年缩小。到2010年，仅中国一家的GDP就占到美国的40%，整个东亚新兴经济体的GDP占到美国大约65%，加上日本在内，东亚国家的经济总量约达15万亿美元，超过美国而接近欧盟的水平。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仅中国一家的经济总量就达14.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4.6万亿美元，^[10] 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总量则相当于欧美经济总量之和。同时，东亚地区外贸总额约达6万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外汇储备超过5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70%。东亚地区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50%，超过欧美之和。现在，东亚地区已发展为全球财富中心之一和全球经济增

长的主要引擎，经济实力同欧美处于同一等高线。世界经济已形成西欧、北美、东亚三足鼎立格局。

（二）亚洲区域一体化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区域合作机制一体化程度和水平是体现一个地区战略重要性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亚洲区域合作组织深度整合，一体化水平显著增强。东亚作为人口幅员为亚洲大陆主体的区域在这方面做得尤为突出。首先，东盟一体化建设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已签订并实施具有某种主权国家宪法性质的《东盟宪章》，标志着东盟一体化事业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东盟宪章》提出到2015年建立“东盟共同体”的宏大目标，表明它朝着建成全面一体化实体的方向迈出了关键步伐。由于东盟是东亚区域合作的基础和始发平台，其一体化水平的提升对推进整个东亚地区的区域整合有重要作用。其次，地区自贸区建设取得重大突破。2010年东盟先后同中国、日本、印度这三个最大的亚洲国家正式建成自贸区，这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历史性事件。从此，东盟分别与中、日、印这三大经济体进入零关税时代，为相互经贸关系的跨越式发展和一体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也为这些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后劲和动力。东盟—中国自贸区是其中的最大亮点。这一自贸区拥有19亿人口、超过7万亿美元GDP、4.5万亿美元的贸易总额和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之一。它正式启动后，凸显成效，2010年1月至11月，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2630亿美元，同比增加40.6%，双创历史新高，其中增速为双方所有双边贸易中之最。此外，东亚地区更大范围内的自贸区建设计划如成立中日韩三国自贸区和东亚地区自贸区的问题也在酝酿之中，整个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前景遥现曙光。再次，大东亚地区整合进程初见成效。几年前形成的由东亚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参与的东亚峰会机制不断加强，有效增进了各成员国的政理解、安全互信和经济合作，成为推进东亚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平台。2009年东亚峰会正式提出成

[9] 琳琳等：《2010年全球经济冷热不均》，《环球时报》，2010年12月3日，第24版。

[10] 萧达等：《中美世纪对话全球瞩目》，《环球时报》2011年1月18日，第1版。

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为整个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绘出远景蓝图，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同时，中亚区域合作的主要载体上海合作组织不断扩大与深化全方位合作，是亚洲区域合作的另一大亮点。

亚洲区域合作组织的深入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地区的竞争力和内在凝聚力，是地区整体实力和地位大幅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

长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重心一直放在世界地缘政治经济中心之欧洲—大西洋地区。进入新世纪后以来，为适应亚洲崛起及其引发的国际形势新变化，美国逐渐将其对外战略重心东移亚洲—太平洋地区。

其一，军事布局重点东置亚太。在世纪之交，美国海外军事部署逐渐呈现西缩东扩态势。现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已取代欧洲—大西洋地区成为美国对外军事战略重心。

首先，亚太是美国海外驻军和海空力量部署最多的地区。美国在亚太前沿长期保持 10 万驻军，加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队，它在亚洲的驻军达 30 万之众，是其驻欧军队的 4 倍。它的海空军主力——航空母舰、战略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的多数部署在亚太。它还大力加强从夏威夷到关岛一线的西太平洋第二岛链的军事部署，包括不顾财政危机花费 100 多亿美元巨款在关岛建设世界上最大和最现代化的军事基地，以随时向亚太第一岛链快速驰援。第二，亚太是美国展示军威、军势的主舞台。后冷战时期，美国显示强大军力的主要手段有二，一是打大规模局部战争，二是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它近些年来打的两场大规模局部战争都在亚洲地区。现在伊拉克战争虽已基本结束，阿富汗战争还在扩大之中。亚太地区还是美国举行单独、双边、多边联合军演最频密、最集中之地区。2010 年它在该地区举行的各类军演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针对性之强和离它所认定的战略对手之近都是空前的。最近它还派出三艘航母在西太平洋巡弋，以威慑其心目中的“敌手”。第三，提升与亚太盟

国的军事联盟关系。美国在与北约盟国关系处于停滞状态之际，着力加强与深化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军事盟友关系，并加强了与印度和印尼、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军事安全关系，企图以美、日、澳、韩为轴心，以印度及一些东盟国家为外围，筹组亚洲“民主国家联盟”，以最终达成组建亚洲版“北约”组织的战略构想。

其二，高调重返亚洲，将其定为对外政策重点。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先后将其外交重点置于欧洲和 中东，而对亚太地区有所忽视，结果导致其对整个亚洲的主导能力和影响下降，有碍其推进全球战略目标。奥巴马上台后，鉴于亚洲持续迅猛崛起、世界战略重心加速东移，以及“前朝”之失，迅即大幅调整对亚洲政策，提出“重返亚洲”的诉求，他还将自己定为“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将其外交重点移向亚洲。为此，奥巴马政府推出三大外交举措。一是将亚洲定为其外交主攻对象。近年来，访问亚洲的美国高层政要之多、美国与亚洲国家最高领导人对话之频繁，均为世界各大洲之最。二是力推并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力图将 TPP 打造成由它掌控的跨太平洋大型自贸区组织，以确立由它主导的亚太经济新秩序。三是升级同东盟的关系。小布什主政时期推行唯美是尊的单边主义，美国同东盟明显疏离。奥巴马大幅调整了对东盟政策，加大了对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投入，赢得了东盟的好感。特别是在 2010 年奥巴马政府签署了其前任一直拒绝的、以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为基调的《东南亚友好条约》，为建立美国—东盟峰会机制和美国参加东亚峰会机制铺平了道路。这标志着美国与东盟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是它“重返亚洲”政策的一个重大突破。

美国作为西方盟主和独超，利益遍及全球，它对各地区的重视程度折射出该地区的战略分量。美国对外战略重心东移亚洲，同亚洲战略地位攀升密切相关，也是世界战略重心加速移向亚洲板块的反映。

亚洲崛起是当代世界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预计未来亚洲国家的发展速度仍将走在欧美国

家前头，亚洲崛起势头将继续快速推进。然而从总体看，亚洲的崛起尚处于初始阶段。亚洲的经济总量虽同欧美相当，但人均国民产值比欧美差得远，论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论总体硬实力和软实力，亚洲同欧美不在同一档次。世界战略重心移向亚洲还只是一种趋势。亚洲的真正崛起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洲基本到位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四、西方体制失色，世界制度模式朝多元化方向演变

多个世纪来，世界一直受西方思想和制度绝对支配。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崛起，才打破了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冷战结束后，西方以冷战的胜利者自居，以为恢复了其“一统天下”的旧日辉煌。西方有些政学界代表人物提出“历史终结论”，断言社会主义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认为西方的政经模式作为“普世价值”是“绝对真理”和历史“终极模式”。然而当代历史进程表明，“历史终结论”并没有终结历史，反而被历史所终结。社会主义没有消亡，而是在一些国家经过改革正浴火重生；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光环愈益消褪，绝无可能成为世界唯一模式；世界逐渐走向模式多样化的时代。

其一，在南北经济增长的巨大落差中，美国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弊端毕现，促使发展中国家探索并实行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西方国家把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捧为世界上最优越的制度和“永恒真理”，强要非西方国家一体效仿。这种观点和做法遭到实践和历史的无情否定。应当说，西方的经济模式基本上适合西方国家，造就了它们高度发达的经济和物质文明。但其发展到当代，弊病和劣势日益显露，其中尤为严重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味强调“大市场、小政府”，极度神化市场作用，将其绝对化，任其放纵自流，结果导致经济长期低迷，贫富两极尖锐分化，最后酿成70多年来空前严重的危机。美国还将其模式包装成“华盛顿共识”强加给拉美等地区的发展中

国家，给它们造成严重恶果。而那些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蒸蒸日上的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经过比较和反思认识到照搬照抄西方模式则衰，选择适合本国条件发展模式则兴，因而纷纷抵制西方模式，坚持走自己的路。

其二，西方民主攻势受挫，发展中国家普遍选择适合自己特点的政治体制与民主模式。

西方竭力美化其政治制度和民主模式，将其说成是举世适用的“普遍真理”和唯一体现“进步”和“人性”的完美政治模式，并强行向发展中国家和尚未西化的转型国家扩展，以重建西方政治思想体系在世界上的绝对支配地位。作为西方盟主的美国更是把在全球促进民主作为其对外政策纲领和核心目标，穷尽各种手段，甚至不惜诉诸战争，向非西方国家强加美式政治体制和民主理念，希图在全球确立美国的政治和思想霸权。

然而，由于各国之间国情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国情更是千差万别，当今世界不存在整齐划一的统一的“普世模式”。而西方的政治和民主制度并不美妙。它们所谓的全民自由选举、三权分立体制和民主政治模式受金钱支配，主要是特权圈子、利益集团、大企业老板和有钱人的“玩艺”，是为这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的，而同广大中下层人民不大相干，其中占人口相当多数的贫穷民众还被社会边缘化，备受欺压和歧视。更有甚者，西方的“民主”对内对外是两张皮，对内讲民主，对外讲强权。西方列强对穷国、小国、弱国从不讲民主，而坚持实行旧列强那套大欺小、富压贫、强凌弱的强权政治。可想而知，西方这种“民主政治”模式必然在发展中国家“水土不服”，勉强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付出了惨重代价。美国通过战争对阿富汗、伊拉克进行了“民主改造”，但两国战乱局面仍难收拾；实行西式“民主”的国家，有的（如泰国）长期政局不稳，社会陷于持续动乱；有的（如海地和科特迪瓦）大选刚过即发生大规模骚乱，甚至陷于内战边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与此相对照，那些选择适合本国条件的政治体制的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实现了政局稳定、经

经济增长、社会进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拒绝照搬西方的政治和民主模式。美国在全球强推“民主”的政策到处碰壁受挫，一度甚嚣尘上的“颜色革命”偃旗息鼓，有的“颜色革命”曾经成功的国家出现反复，同美国等西方列强拉开了更大距离。西方欲以其政治、民主模式再次一统天下的企图不可能得逞。

其三，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焕发出强大生命力。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32 年以来，各条战线突飞猛进，综合国力不断跃升新台阶，经济每年平均以近 10% 的幅度高速增长，2010 年与 1980 年相比，经济总量增长了 22 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 16 倍，人民生活从温饱型进入小康型，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和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实行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那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即政治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

(上接第 69 页)

第三，中美两国的认知差距在拉大，战略互疑加深。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竞争者，中国对美国行为的回应与反对被美国视为中国态度更“傲慢”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被认为是挑战美元霸权地位，美国还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2010 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中国军力报告》均体现出美国对中国军力发展的关注和担忧。中国也认为美国加强对亚太投入目的是为了遏制、围堵中国，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崛起，要限制中国的发展。

四、对 2011 年中美关系的展望

对于 2011 年的中美关系，专家们普遍认为难逃“大事没有，小事不断”的怪圈。经贸问题还会继续成为中美的棘手问题。在美国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共和党与民主党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趋同，都将矛头针对中国，众议院的新任领导人如外事委员会主席鲁斯莱蒂娜在贸易、人权等对华议题

合作、民主协商体制；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形态和政府宏观调控与自由市场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成长途径上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实践证明，中国的制度模式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的发展和模式的成功证明了一条真理，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靠照搬他国模式，而必须探索并走上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这有助于世界制度模式多元化趋势的发展。

未来世界模式多元化进程将继续发展下去。鉴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是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主角，北强南弱、西强东弱的局面尚未有实质性改变，西方政治制度和观念形态根深蒂固，西方模式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世界的主要模式。但它也不可能压倒其他模式重新成为“天下至尊”。当今世界已进入各种模式和平共存、良性竞争为主的时代。哪种模式更有优越性，能在长期竞争中胜出，最终要由实践、历史和世界人民来证明和做出取舍。

上态度偏于强硬。中国还会继续面临人民币升值、贸易平衡方面的压力。同时，朝核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中美在朝鲜半岛的摩擦仍将继续。

然而，2011 年的中美关系不太可能像 2010 年一样大起大落。经过一年的磨合，双方心态趋于平和、现实，中美面临发展关系、积累成果的好时机。美国中期选举刚刚结束，2011 年是中期选举和大选的间歇期，其国内的干扰会相对少一些。年初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尤其是胡锦涛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回暖创造良好开端。

总之，中美双方都已认识到两国关系的稳定对双方至关重要。中美已日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联体，两国之间不仅谁都离不开谁，而且谁也承受不了关系恶化带来的影响。从中东到阿富汗再到朝鲜半岛，从全球金融机制改革到气候变化应对，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美合作。未来中美之间力量均衡的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旧矛盾与新问题将并存，两国的关系发展将在曲折中前进。

PRÉCIS

The International Positioning of China and the Strategic Principle of “Keeping a low profile while getting something accomplished”

Adhering to the strategic principle of “keeping a low profile does not suggest following a stereotype. Only by properly balancing this principle with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rethinking its connotation and phrasing so as to keep advancing with the changing times, can we better inherit its spirit and eventually fulfill the national dream of turning from a populous nation with increasing economic strength and political influences to a harmonious one with advanced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Patter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s brought major and profound changes to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structure. The world witnesses the synchronous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fast-proceeding multilateralism, the narrowing North-South divide, the balancing geopolitical powers and the diversifying institutional regimes. However, these developments are still in the gradual phase of quantitative change without changing essential content in the near future.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 the North-South inequality and the Western-led international system will last for certain years.

An Analysis of the Adjustments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Global Strateg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carried out several adjustments in its global strategy since it came to power in 2009. For example, the strategic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 pattern has shifted from “Pax Americana” to multilateral engagement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rategic guideline has replaced the previous violent approach of regime change with more productive “Smart Power”; the strategic focus has moved from highlighted military security concern to fields of economy, education, technology, energy, nuclear safety, Internet and special activities; the strategic distribution has gradually shaken off the Greater Central Asia Partnership and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nitiative to pursue strategic contrac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so-called U.S. “return to Asia”; the military notion of “simultaneously winning two conventional wars” has been modified to “winning the present war” for the first time; the strategic approach has adopted the “selective multilateralism” instead of mere unilateralism. Even these efforts have showed some signs of success, it is unlikel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revive its unipolar hegemonic dream.